

特 稿

对办院方针的历史回顾^{*}

樊洪业

(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0)

摘要 对在中国科学院发展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方针”做了系统回顾和简要分析。从中可以看出,2002 年提出的新办院方针既有其历史继承性,更有重大的调整。它明确了中国科学院为实现国家目标而在国家现有科技体制中的战略定位和任务取向。

关键词 中国科学院,方针,历史回顾

在中国科学院 2002 年度工作会议上,路甬祥院长在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新时期的办院方针。将新方针与以往的历次办院方针相比较,既可以看到其间的继承关系,更可以看到有重大的调整。究竟继承了什么,调整了什么?有必要对办院方针的历史演变做简要的回顾和分析。



的、对事业发展方向起规定作用的指导原则。

在现代中国人的政治经历中,“方针”似处在路线之下、政策之上。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又是交叉互含的,其间很难划出一个明显区分的界线。具体而论,够格被称为“方针”的也有过很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力更生”,“勤俭

建国”……,皆为人们耳熟能详者。

中国科学院是国家与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组织学的角度看,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既应体现本院的组织目标,也应规定出实现其目标的基本方略。制约办院方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目标(表述为国家发展战略、基本路线或基本政策);党和国家领导层所持有的科学观以及对本院发挥特定功能的期待;在国家和社会体制结构中对本院应有地位与作用的认可等等,

1 咬文嚼字说“方针”

方针,顾名思义,是“指出方向之针”。在中国古代,它本来是罗盘(指南针)的一个别名。后来,人们把罗盘的定位指向作用引申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说“指南”时,一般是指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对大众起向导作用的那些成熟的经验和知识;说“方针”时,则是指在社会事业的层面上,由领导者提出

* 收稿日期:2002 年 2 月 25 日

当然,院领导集体的战略眼光、政治智慧和决策能力以及本院的既有实力与发展潜能,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2 建院初期的“总方针”

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在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旧有研究所的基础上整合组建新研究所的计划已告完成,院办公厅曾通知院属各研究所开会讨论研究方针、具体任务和工作计划。就事后所得报告而言,各所对“研究方针”的理解,就是指本所的业务发展方向,事实上后来在研究所一级也只用“方向”。方针,属院而不属所。

在汇总各所情况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起草了《本院关于基本任务的指示》,在呈报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之后,由文委做了修正。同年6月14日,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郭沫若主任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为题下发。其中写道:

“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第五章的文教政策,其中特别关于科学研究的指示,即为改革过去科学研究机构的总方针……”。

这个总方针是什么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在1949年9月通过的,其中专列第五章为“文化教育政策”,与科学相关者,有以下规定: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第四十二条 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

第四十三条 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

第四十四条 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

社会科学著作。

就组织的性质而言,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有两点与后来有明显不同。第一,科学(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被归并在文化教育事业中,科学院属于上层建筑的部门,实际受中宣部领导。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科学院是政务院之下的一个部级建制机构,统管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上述四十一条中的“总方针”,实际上是针对一切上层建筑部门的,即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只有第四十三条强调的自然科学“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是针对国内一切科研机构的,这是毛泽东强调的“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在科学工作中的延伸,具有方针性的指导意义,但这时还未形成对“办院方针”的明确表述。

3 围绕“理论联系实际”的摇摆与纠偏

建国初期,中国科学院遵循自然科学“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的要求,做了大量工作,但也出现了明显的偏差。有些领导干部不了解科学研究工作的特点和科学与技术的区别,一味强调与生产实际结合。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许多科学家的研究课题受到了“方向”性的质疑和批判。为了联系生产实际,有机化学家庄长恭,放弃了他多年从事的固体醇的研究。实验生物家朱洗,中止了他所专长的单性生殖和混精杂交研究。一些研究所只选择在近期可以出成绩的研究题目。青年科学工作者中把“实际”只理解为纯粹的直接的的生产任务,甚至把阅读理论书籍也指责为是脱离实际。

当时主持院务领导工作的是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张稼夫,在由他主笔起草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1953年11月)中,反映了上述情况。并针对现实问题提出了科学院当前的重点工作为:(1)组织力量支援国家工业建设,首先是重工业建设;(2)有重点地对拟建设的工业中心或经济区域进行自然条件和资源的调查研究;(3)相应地发展基础科学,使之成为不断支援国家建设和不断提高科学水平的有力保证;(4)对于在生产上或学

术上迫切需要,而目前十分薄弱或根本缺乏的学科,要立即充实与建立。

在 1954 年 1 月 28 日召开的政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听取了科学院的报告后做出明确指示,首先谈的就是“方针”。他批评了前一段时间里普遍存在的错误倾向,指出“要辩证地解决理论与实践、今天与明天的问题。我们发展科学不是片面的,必须两方面结合起来。理论与实践结合,但实践靠理论指导;今天与明天也要结合起来,不能只看眼前。”

同年 3 月,中共中央对院党组的报告做出了长篇批示,其中涉及科学院在国家科学事业中的地位和任务分工问题:

“科学院是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除了应以主要力量组织本院的科学研究工作外,还必须密切联系全国科学工作者,协助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

“科学院主要是研究基本科学理论问题和解决对于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的科学问题。生产部门的科研机构主要是解决生产中的实际技术问题。高等学校则视具体条件,研究基础的科学理论或实际生产中的科学问题。”

4 “火车头”时期

自 1954 年 9 月起,科学院不再列为政府部门。1955 年 6 月召开了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科学院被明确认定为“国家最高学术机关”和“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大约与此同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出发,对科学事业和知识分子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1956 年 1 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周恩来在大会报告中进一步批评了忽视科学理论研究的“近视倾向”,提出要“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

在这一年里,国务院组织制订了具有战略意义的《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在实施该规划的过程中,科学院配合“两弹”攻关,开创新造卫星事业,落实“四大紧急措施”,部署和组织自

然资源综合考察和基础理论研究,充分发挥了“火车头”的作用,创造了“文革”前的十年辉煌,同时展现了作为国家特殊战略资源的实力。

值得指出的是,在大跃进的声浪中,在正确方针指引下的科研活动受到冲击的情况下,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和院党组及时提出了科学院科研工作的重点:一抓尖端科学技术,二抓国民经济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三抓基础研究(略称为“一抓尖端,二抓重大,三抓基本”,简称“三大抓”)。随后,在前苏联撕毁合作协议、使中国许多尖端技术工程项目陷入困境的情况下,院党组又于 1961 年提出“一保、二补、三探”的方针。一保,是配合保证五院(负责研制导弹)和二机部(负责研制原子弹)的设计、试制需要;二补,是本院自提研究试制项目,作为国家第一位任务的补充;三探,是为下一步工作探路。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皆隐现其中。

“三大抓”和“一保、二补、三探”,是在面向当时国家战略需求和追踪世界科技前沿的前提下,为安排本院科研任务而提出的指导原则,可以视为那一发展时期“办院方针”的基本内涵,只是当时没有从文字上去这样明确罢了。

5 首次明确提出“办院方针”

十年辉煌之后是十年浩劫,劫波过后有举国上下的科学热。此时,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机构已另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国家科技体制方面,则时称“五路大军”。面对新形势,部署新任务,方毅院长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中国科学院应承担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发展自然科学的新理论新技术,配合有关部门解决国民经济建设中综合性的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要侧重基础、侧重提高。”

延至 1981 年 1 月,院党组向党中央报送《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并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从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自然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的地位出发,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办院方针”,其内容是“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党中央对“汇报提纲”表示同意,并认为所提出的办院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两侧重、两服务”的办院方针,是在国家认可科学院既有组织功能和体制地位的前提下,在总结建国后至“文革”前(尤其是十年黄金时期)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

6 在深化改革中的探索

上述办院方针敲定之日,正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举步维艰之时。经济体制牵动着科技体制。当时的国务院负责人提出“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这是一个基本的战略方针。”此后正是以此方针指导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描画科技体制改革蓝图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两侧重、两服务”的方针面世不足三年就“退休”了。1983年底,中共中央书记处就科学院今后一个时期的方针和任务作出指示,要求是“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而有选择地参加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研究”。三种类型的工作主次分明,实际上否定了“两侧重”。

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揭开了全面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在此框架之下,中国科学院对办院方针做了进一步的调整,即“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跟踪”。

体制改革给科学院带来的变化是巨大而深刻的。改革,必然是几代人的漫长的探索实践过程。

经过一段摸索之后,1991年,办院方针修改为“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服务目标从一变为二,“高技术”则从“跟踪”到“创新”。这一修改,表明了“战略”意识的回归。

1994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为纪念中国科学院建院45周年题词:“努力把中国科学院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研究基地,成为培养造就高级科技人才的基地和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

1999年10月,江泽民为纪念建院50周年的题词中,又进一步要求科学院要“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为我国经济发展、国防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创新贡献。”

在此前后,科学院启动了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又经过几年的改革实践,提出了新时期的新办院方针。笔者撰写本文,意在为解读新办院方针提供一个历史的参照。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反射出来的“办院方针”历史轨迹中,可以看到科学院在战略定位上的变化。不管是它的模糊或迷失,还是它的清晰或强化,都不仅仅是科学院自己的事,科学院是国家的特殊战略资源,曾为共和国的历史写下过光辉的篇章。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科学院也将会在新的战略起点上为中华民族续写出新的辉煌。

樊洪业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42年出生。196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化学系。1965—1985年先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1980年以来,从事中国近现代科学史和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著有《对科学业迹的辨伪》、《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科学旧踪》、《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主编)等。现在主持《竺可桢全集》编纂工作。